

“纵横计不就”：王闿运光绪四年

“出山入川”发微¹

吴仰湘

(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, 湖南 长沙 410082)

【摘要】：王闿运受聘主讲四川尊经书院，是他传奇人生中备受关注的一件大事。而翻检相关史料，发现王闿运光绪四年“出山入川”，接受总督丁宝桢邀聘，初衷并非充任尊经书院山长，后来他勉强受聘，却不安于位，拟想“辞师居友，聊尽所长”，再展其“纵横名士”的奇才大略，扶助丁宝桢、刘长佑在西南成就霸业，但“赞慕无功，诲人复倦”，于光绪十二年倦归湖南，留下一段“纵横计不就”的豪情与悲苦。

【关键词】：王闿运；丁宝桢；四川尊经书院

【中图分类号】：K252 **【文献标识码】**：A **【文章编号】**：1008-1763(2018)02-0001-06

王闿运(1832-1916)在清末民初名满天下，留下不少轰动一时、流传至今的轶闻传说。其中，王闿运于光绪四年(1878)接受四川总督丁宝桢邀聘，前往成都担任尊经书院山长，将今文经学带入四川，培养了廖平、杨锐、宋育仁等一批著名学生，促进近代四川的人文蔚起与蜀学复兴，这是有待于历史研究细作检验的一大美谈。本文依据《湘绮楼日记》《湘绮楼笺启》等资料，仅就王闿运此次“出山入川”的始末详情作一考察，揭示这位“纵横名士”一段鲜为人知的心路历程，并对流传的某些说法略作补正^①。

四川尊经书院由学政张之洞、绅士薛焕等人合力筹创，于同治十三年(1874)正式开办，原拟延聘东南名儒俞樾等人川掌教，未能如愿。王闿运自称“于乙亥即得薛兴文致聘”^{[1] (P845)}，即光绪元年接到薛焕的约聘函，应四川省官绅因俞樾等不肯受聘，转而邀约王闿运。薛焕与王闿运此前有无交往，不得而知。创办尊经书院的实际主持人张之洞，王闿运与他早已稔熟。二人自同治十年(1871)京师订交，“一见欢然”^{[2] (P277)}，不仅诗酒酬唱，还多次商讨经学，说《易》尤相投契，颇有同道之感^②。王闿运离京南返，张之洞特作长诗相送，对王闿运大加称赏^③。据《湘绮楼日记》，张之洞赴川任前数月，王闿运曾“作书寄香涛”^{[2] (P384)}，日记未载具体内容。但三日后王闿运寄潘祖荫一书，议请潘氏“于辇下别设书局，使周秦子说悉得刊行，兼以余闲删定

¹【收稿日期】：2017-12-10

【作者简介】：吴仰湘(1970-)，男，湖南溆浦人，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，博士，研究方向：湘学史与经学史。

^①对于王闿运掌教四川尊经书院后传播《公羊》之学、直接影响廖平从古文经学转向今文经学的流行说法，笔者《论廖平1880年并未转向今文经学》(载《湖南大学学报》2009年第3期)已有辨析。

^②同治十年五月至七月间《湘绮楼日记》常记与张之洞往还宴酬事，有时数日连记，有时一日数记，可见往来之密。张之洞同治十年四月间筹办龙树寺宴集致潘祖荫书札中，一再推许王闿运，谓其经学、诗、古文、骈体均有声名，详见王树枏编：《张文襄公全集》卷214《书札一》。

^③今存张之洞诗集中，有《和王壬秋五月一日龙树寺集诗》一首、《和王壬秋孝廉食瓜诗》三首及《送王壬秋归湘潭》长诗，见《张文襄公全集》卷221《诗集二》。在送行诗序中，张之洞称赞“壬甫才调冠时，善谈经济，《哀江南》一赋，海内知名，遍历诸侯，朝贵折节”，引见许同莘编：《张文襄公年谱》卷1，舍利函斋1939年刻本，第17页。

经疏，广求才识之士，使闾运亦得趋走其中，诚为盛业”，又说“尔时即已与书孝达及钱师，询其可否”，“今岁星轺分出，惜所居唯当桂驿，湘桂小典，不辍大臣，惟冀孝达盛总南选耳”^{[2] (P385)}。据此，可以推想王闾运此次写信给张之洞，不外共商谋设书局与冀其获选出考大省。随后张之洞出充四川乡试副主考，乡试过后又简放四川学政，继而创办尊经书院，并附设书局。现存《湘绮楼日记》缺失同治十三年正月至光绪元年六月的记载，因此关于张之洞来川后的举措与创建尊经书院等事，王闾运有何反应，今已不得其详，但从现有资料中仍能窥测一二。王闾运光绪三年（1877）致丁宝楨函中，言及“人蜀胜览，自香涛视学时已有前约，因惮独行，又嫌提挈，逡巡有待。旋闻彼方有主讲之议，尤难自赴”^{[1] (P938)}。在光绪五年（1879）致张之洞函中，他又写道：

乖违九秋，中通两讯，皆未得手复，未知谁浮沉也。今岁在蜀，曾因敖金甫致声，兼有婚姻之议，亦竟未得教书。京都官忙懒相并，此例自久。然时闻声咳，未为疏阔。尊经筑舍，诸生大盛；复得门下领选，搜岩采兰，极称得士。……闾运于乙亥即得薛兴文致聘，恐惧惭惶，虽极思一奉光仪，犹虑自书黄纸^{[1] (P845)}。

从中可知王闾运对张之洞确是时相萦怀。前引王闾运致潘祖荫函中，托庇师友、相与讲习学术之意甚为明显。但是，当张之洞简任四川学政后招邀往游，王闾运却嫌其提挈，迟疑不进，继而接获薛焕之函，欲聘主尊经书院，竟托词“恐惧惭惶”“犹虑自书黄纸”，裹足不前，让人费解。

但是过了不到三年，王闾运却应允新任四川总督丁宝楨的邀约，并于光绪四年冬天买舟入川，变化之大实在耐人寻味。

王闾运与丁宝楨早有交往。根据《湘绮楼笺启》卷4所收《致丁亲家》，同治初年丁宝楨出守长沙时，即有延聘王闾运入幕之意；同治末年丁宝楨防堵黄河在山东的决口时，王闾运特将咸丰九年（1859）暂居山东巡抚文煜幕中所拟疏文寄交丁宝楨，进献治河的方略、措施；光绪二年九月丁宝楨由鲁抚升任川督，王闾运冬天即得其幕府来书。翌年五月六日，王闾运又得陕西巡抚谭钟麟（文卿）一书，“云丁督欲招余，岁致三千金”，他的反应是“嫌其币重”，虽有友人劝行，他却“未能决”。^{[2] (P570)}丁宝楨以岁金三千相邀，应该言明是延聘王闾运主讲尊经书院，因为后来付给王闾运的薪金确是此数。可是，王闾运在日记中，却绝口不提丁宝楨邀聘他出任主讲事。数日之后他致信丁宝楨，日记仅说“作书寄丁穉璜，言吏事”^{[2] (P571)}，根本未及尊经书院聘任之事。所幸此信留存在《湘绮楼笺启》中，给后人窥探王闾运关于应聘尊经讲席的真实心态提供了宝贵线索。王闾运在信中大谈如何整饬川省吏治，进言献策，仅以数语辞谢尊经讲席之聘，其中说：

昨得文卿兄函述雅意，垂询游处之迹。入蜀胜览，自香涛视学时已有前约，因惮独行，又嫌提挈，逡巡有待。旋闻彼方有主讲之议，尤难自赴。今闻持节，欣愿趋依。文兄所筹旅费、家用，其事纤俗，似非雅论。但去岁经手编集《湘军战守事录》，今年五月方始创稿，半岁未必能成。要俟此书写定，乃能买舟溯江，上谒辕门耳。闾运城居一年，应酬颇剧，学业无进，深负赏音。因承寄讯，先行奉复。^①

王闾运重提三年前邀约旧事，又说“学业无进，深负赏音”，仍是婉辞尊经书院讲席之聘，但说“今闻持节，欣愿趋依”，承诺暇时将赴川一游，“上谒辕门”，游幕之心早已溢于言表。及至光绪四年七月十七日，王闾运接川籍友人敖金甫一信，“乃知川中仍有院长之聘”^{[2] (P674)}，笔下颇多怅触之意。《湘绮楼日记》又载王闾运八月朔日“作书寄丁、方四川，为骆县丞干谒”^②，对川中仍延主讲之事，王闾运此次致丁宝楨信中有无回绝，今已不得而知。八月二十日有友人相约同赴四川，王闾运仍以《湘军志》书稿未毕不能成行相答^③。但他在八月二十九日另一封信中，却说：“《军志》甫成十篇，尚有短篇七首未就，思于九月毕功，溯湘一别，为出山人川之计，刻下正冗迫也。”^④及至十月，王闾运多次表示即将远行赴蜀^⑤，并在覆唐酌吾书中写道：

^①王闾运：《致丁亲家》之二，《湘绮楼笺启》卷4，第938-939页。按，王代功《湘绮府君年谱》光绪四年条下有谓：“八月，四川总督丁丈穉璜遣书，约往四川。又致书谭丈文卿，属其劝驾。府君答以撰《军志》毕，始定行期。”今查光绪四年八月《湘绮楼日记》，并未记载此事。而此条年谱所叙，颇与光绪三年五月《湘绮楼日记》及此处所引王致丁函所言相合，故年谱很可能误系此事于光绪四年八月。

^②王闾运：《湘绮楼日记》，第678页。按，方指时任四川按察使方浚颐，字子箴，安徽定远人。

“闾运以丁宫保前岁久要，于十月内《军志》告成，即行买舟入蜀，游期久暂未定，眷口尚寄城中。”^③王闾运再三以游蜀之行昭告友人，却不言及尊经书院邀聘之事，并谓“游期久暂未定”，皆可见其不想应聘出长尊经书院的内心。

王闾运这种希望游幕督府而不愿居尊经讲席的心理，在他光绪四年岁末抵达成都之后，表现得极为明显。《湘绮楼日记》光绪四年十二月廿八日有关王、丁首次见面晤谈的记载中，有说：

午正出访丁公，牙参未散。……再过督署，与樾公谈安南事，不相合。又论凡国无教则不立，蜀中教始文翁遣诸生诣京师，意在进取，故蜀人多务于名。又言蜀土薄，米菜俱无实味。议颇入微。余三辞掌教，不见从，且姑徐之。^{[2] (P720)}

丁宝桢重金邀约王闾运，一直是为尊经书院求师，王闾运却在见面后，开口即谈安南事，当然话不投机，导致“不相合”。丁宝桢转而谈论以教立国之事，明言蜀士务名之弊，可见其延师兴学的良苦用心。王闾运谓其“议颇入微”，对丁宝桢一番苦心可谓心知肚明。但他“三辞掌教”，虽“不见从”，而仍执己见，实在是因为他此次践约入川，从未考虑过应聘尊经讲席之事。王闾运在四天后写的家信中，就非常明白地说：“主人相见，专以主讲为辞。辞湘就梁，殊非吾意。”^④可见，丁宝桢一见面就“专以讲席为辞”，完全出乎王闾运意料，与其蜀游初衷相违背。如果是聘任书院讲席，王闾运实无必要舍近就远，“辞湘就梁”，因为湖南学政朱通然正在筹建长沙校经书院，有意延聘他为院长^⑤。

王闾运在勉强受聘担任尊经书院主讲后，更是多次在致友朋信中言及应聘之事有违初衷。如光绪五年二月底致敖金甫书中，他回顾游川及受聘之事说：

去秋复上一函，计达清鉴。仲冬溯峡西上，除夕前日，届于成都。比见丁公，果如所谕，谬以讲席相处。初以三年宿诺，意其求友之乔声；不图千里寻师，乃作担簦之来教。逡巡三让，固执一辞。便欲告归，实为骇听。今年二月，移入馆中。^⑥

由“便欲告归”一语，推想王闾运当时在三辞掌教不获俯允之际，曾有掉头逃归之想，但因于友道有违，未采取此种激烈行动（其时因川省某些官绅诬控，朝廷正派钦差来川查核，后丁宝桢于光绪五年六月受革职留任处分^⑦）。王闾运七月间复刘长佑一函，又追述自己无奈羁留蜀中的缘由说：

闾运于去岁撰次《军志》已毕，遂为西游。初拟由蜀、秦、关、陇还，循黑水而南，以图良规。及至华阳，樾公留主讲席，诸生已集，势不可辞。好为人师，古贤所患，但上下牵缀，去留不得自如，以负嘉招，惭于通讯。^{[1] (P802)}

③王闾运在日记中载此事：“（殷）竹伍来，云丁督以三百金礼之人蜀，欲与余结伴去。余辞以书未毕，不能也。”见《湘绮楼日记》，第683页。

④王闾运：《与张世兄》之五，《湘绮楼笺启》卷1，第794页。按，张世兄即张文心。此信中有“八月廿日，大儿幸得一子”，据《湘绮楼日记》，王氏长孙出生在光绪四年八月廿日，同月廿九日记另有“作书致文心”，故知此信作于光绪四年八月廿九日。参见《湘绮楼日记》，第683页，第686页。

⑤王闾运十月十四日记有云：“遣迎梦缙人乡小住，令得少休暇，兼以将远行，小聚谈也。”又十五日所作寄友人诗中，有云“近欲梁州去，知君忆弟情”。均见《湘绮楼日记》，第696页。

⑥王闾运：《致唐郎中》，《湘绮楼笺启》卷1，第799页。此信另见《湘绮楼日记》，第699页。

⑦王闾运：《湘绮楼日记》，第725页。另见《与孺人》之二，《湘绮楼笺启》卷2，第872页。

⑧王闾运在日记中，一再言及学政朱通然（肯甫）咨请他恢复湘水校堂并拓建校经书院之事，见《湘绮楼日记》，第544页，第687页，第698页。

⑨王闾运：《致敖郎中》，《湘绮楼笺启》卷1，第799页。函中“果如所谕”，即前引《湘绮楼日记》光绪四年七月十七日所谓“得敖金甫，乃知川中仍有院长之聘”。同年八月八日记有“作书复金甫”（《湘绮楼日记》，第679页），即此函所谓“去秋复上一函”。此函全文又见《湘绮楼日记》光绪五年二月二十八日，第754-755页。

从王闿运的西游计划看，他是半途被丁宝桢截留，强居讲席。再如九月致张之洞书中，也追述受聘诸事，说：

闿运于乙亥即得薛兴文致聘，恐惧惶惶，虽极思一奉光仪，犹虑自书黄纸。旋知两钱主讲，五经斯立。又得稚公五书，约来一觐，中无皋比之议，是以敢作峡游。及至，乃复见羈扳，贸然入院。^{[1] (P845)}

所谓“中无皋比之议，是以敢作峡游”，正是王闿运出于践友人旧约，入川来作游幕计，原无坐拥皋比之想，因此屡发遭羈受累之叹。

然而，由于丁宝桢坚持，加上尊经讲席虚悬，院生待教，王闿运只好勉强应承尊经书院聘约，但仅以一年为期。《湘绮楼日记》光绪五年正月三日夜间致裴荫森一书，专论入蜀以来见闻诸事，由丁宝桢“自恃廉俭，少所匡绳”，以致横遭诬控，论其“义当引退”，并言及自己的处境与计划：

尊经讲席虚县二年，诸生住斋者至百余人，恐不能不稍为料理。严武自去，杜甫自留，亦大非求友之本志。将俟软件稍定、生徒上学时，为之粗立规条，或勉留一岁。倘主人留镇，仍不改弦，近有见闻，岂容默尔？便当辞师居友，聊尽所长。^②

王闿运因担心丁宝桢不久于位，自己肯定不能长留蜀地；假使丁宝桢能留任，他即拟辞去尊经讲席，充当幕友。“辞师居友，聊尽所长”一语，足以显示王闿运的自我期许与游蜀心志。翌日，王闿运又在日记中留下一长段记载，更值得玩味：

申刻榭公招饮，……欲论治理，榭公惟谈闲事，因唯唯而罢。此公盖与刘荫公同，其天质美，故好善，其心境狭，故少思也。闻黄耀庭亦在此，则其所搜采者，亦不得为不求才，但不得其任耳。昔余言胡文忠能求人才而不知人才，曾文正能收人才而不用人才，左季高能访人才而不容人才。榭、荫二君，乃能知、能求而不能任。凡此皆今世所谓贤豪，乃无一得人才之用者，天下事尚有望耶！曾、胡往而刘、丁兴，他日或有流风，留天下一线之路，若刘表之在荆州，亦未为无助耳。为感诗人招祿之义，故再言讲席，亦不复辞，聊以一岁答其雅意而已。^{[2] (P726)}

王闿运很想同丁宝桢“论治理”，贡献其治蜀方略，希冀丁宝桢早日改弦更张，谁知丁宝桢仅视王闿运为师儒，不识其为人才，只在席间作闲谈。王闿运因此有感而发，写下这一段评述文字。王闿运曾经出入曾国藩、胡林翼军幕，屡有献替，但不为所重。如今他又将丁宝桢、刘长佑与曾、胡相提并论，视如救世英雄，由此可以窥知他不甘闲居书院而乐于投身刘、丁帐幕，亟欲赞襄戎机的原因。王闿运在三月廿一日还有一段特别的记载：

出答访榭公，为鲁詹求拂试。谈及夷务，云印度必为战地，英人谋出緬、藏，欲建重镇于藏内，设谍孟拉间以防边。余极称其远略，颇言信而后动之义。又言天下大事，要须六七伟人，而屈指无可当其任者。归而计之，亦未知何人可当，乃知求贤不易，用材较易也。然用材必己有才，此所以难。^{[2] (P764)}

当时朝野纷纷注重东南、西北国防，丁宝桢则深以西南疆域为忧，并以慧眼提出经营西藏、设谍境外的战略规划。王闿运早在光绪二年规劝新授云贵总督刘长佑从速赴任时，就已注目西南，并主动代拟折片，陈述治滇之策，“且自愿往助之”^③。他在光绪四年冬天买舟西游，“初拟由蜀、秦、关、陇还，循黑水而南”^{[1] (P802)}，入滇投依刘长佑，为之赞襄军政大计。因此，羈留成都、聊充讲席的王闿运一闻丁宝桢此议，“极称其远略”，并立即为作谋划，特别考虑要如何得人以担当其任。数月之后

^①王闿运光绪四年十二月廿五日记：“同店有长沙游勇，自成都昨出，言二使已到，多所按问，将不利丁公云。”又光绪五年正月三日记：“除夕前宵，税驾白兔，而二使星已前至蜀，不独按问东乡，至乃注意丁公，牵连仆妾。道员中丁、劳、唐，州县中田、李，并登白简，加以丑词，语甚含沙，情同舞剑。”见《湘绮楼日记》，第719页，第724-725页。

^②王闿运：《湘绮楼日记》，第725页。此函又见《湘绮楼笺启》卷1《致裴船政》题下第一通，见《湘绮楼诗文集》，第824-825页。

^③王闿运：《湘绮楼日记》，第460-462页。另可参见王代功：《湘绮府君年谱》卷二，第14页。

的六月六日，王闿运偶听友人议邀湘阴张自牧来蜀，心中一动，当即燃烛作书。张自牧颇有经世才略，一直钻研于东南督抚，郁郁不得发舒其志。王闿运在书中为他剖析缘由，敦劝他舍东南而入西蜀。书中所言，颇能让人窥悉王闿运注目丁、刘以经营西南的战略思考：

蜀通三藏，地界英、俄，他日蔡州，当今巩、洛，富强之计，久闭未舒。督府宏模，鄙人奇计，小用小效，大叩大鸣。思慕恢廓之风，愿商兵食之略。幸承闲退，可作峡游。秋水向平，无辞一访。纵令无补，聊作看山。若可经营，何难展布？昔陶朱无心将相，而必致千金；诸葛但食一升，而乐窥火井。人生要在发舒其意，岂以言利为讳、求官为卑乎？湘人得志东南，入荀者率皆弩下，由吁、霞凡近，不足提倡故也。君家松公不迎玄德，则与五斗妖人同于草木，何必狙于熟路，唯识淮纲，仰望幼丹，交通崇宇，以为百步王乎？闿运既托业谈经，更无进取之理。若夫瞻言百里，远虑十年，子牟魏阙之思，仲连围城之志，非智者不可与道也。今且先谋兴利，以裕国本，奏调擢用，自在他时，亦非仅区区海关酬参赞之劳耳。书至且宜深思，以副所期。^{[2] (P804)}

王闿运此处对四川战略形势的评判与发展前景的预测，虽是为打动张自牧入蜀的侃侃大言，但确属纵观时局、深思熟虑后的真知灼见，是其结束石门隐居生活后纵横才略的一次集中显现。王闿运自从获知丁宝桢经营西南边防的谋略，对他更为敬仰，誉其“目营四海”，虽材有不逮，而心雄志壮^①。“督府宏模，鄙人奇计，小用小效，大叩大鸣”一语，既可见王闿运对其纵横之学的自负，也可见他对丁宝桢的敬重，襄赞他成就大业的心志因而更加不可遏抑。王闿运光绪十一年底还一厢情愿地表示：“稚公折节下交，非为兴学，预知英人必窥西藏，欲储幕府才耳。”^{[1] (P885)}所以王闿运身在尊经书院，心却不离总督府，始终呼丁宝桢为“主人”，以幕客自居。从《湘绮楼日记》可知，王闿运在主讲尊经书院期间，常以函札或面谈的方式，就川省行政、吏治、人事等问题，向丁宝桢进言献策，甚至讨论及于丁宝桢的个人进退、奏疏草呈等机密要务。不料光绪十二年丁宝桢以劳病致卒，王闿运藉以实现其纵横奇策的志愿落空，只好吁天长叹，从此不再返川^②。

王闿运聘任尊经书院主讲后，事实上一直不安于位，屡谋脱身之计。光绪五年正月十二日，“盐道遣送聘书，定尊经讲席，受而不辞，以既来不可辞也”，但十天后他去拜见丁宝桢，“略言书院规制变通，使官课不得夺主讲之权，主讲亦不宜久设，仍当改成学长，学长亦随课细取，庶免争竞也”^{[2] (P732)}。王闿运关于变通书院管理的这些设想，既为尊经书院的健康发展着想，也有自己的小算盘，其中改主讲为学长的建议，就是他的一条脱身妙计。在二月二十八日写给敖金甫的信中，王闿运即诉说：“锦里之留，因兹难久。意欲得三数高足，分习三科，然后改院长为学长，不借材于异地，乃为佳耳。”^{[1] (P800)}所谓“改院长为学长，不借材于异地”，实即设想以川籍学长取代院长，以便他辞职返湘。紧接着在三月间，因官课事与藩使程豫大起龃龉，王闿运于闰三月十九日“乃送书蔡道台辞讲席”，廿一日丁宝桢来代司道谢过，廿五日蔡道再致聘书，王闿运于廿七日“再退关聘去”，丁宝桢当日亲来慰留，风波始息^③。后来，王闿运虽因施教有成，一度有留蜀乃至迎春的想法^④，但不久又大作去计。九月廿一日，王闿运特意致书居留京城的张之洞，述说自己违背初衷，勉主讲席，竟遭排挤，“名轻学浅，果见推排，势不可已，与相搪突。幸诸生相谅，因爱忘憎，荏苒经年，吁其危矣。离家既远，舍已芸人，又复翩然志于出峡”，然后说：

^①王闿运：《致陈亲家》之四，《湘绮楼笺启》卷4，第933页。按，光绪六年七、月间，中俄伊犁冲突，朝廷甚重东北边防，在野者亦有迁都避敌之说，王闿运则不以为然：“季怀言迁都彰德，结和亲，伐日本，为交夷之长策。余以为中国当经略南洋，通印度，取缅甸，为自治之上策。盖中国积弱，不从他道改弦而更张之，徒议迁都，仍无益也。然此二策犹楚臣三策，可以皆用。”引见《湘绮楼日记》，第943页。

^②费行简也述及王闿运曾以经营卫藏之计进说丁宝桢，“宝桢大称善，檄黄麒才先至探道里，未及设施，竟歿。先生曰：‘丁之歿，吾志之不行也。’自是不复谈大略”，引见《近代名人小传》，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本，第23页。

^③关于此次官课事件及王闿运请辞讲席风波，详见《湘绮楼日记》光绪五年三月十九日、廿一日、廿三日、廿四日，及闰三月十八日、十九日、廿一日、廿四日、廿五日、廿七日，第763页、第765-766页、第774-778页。王闿运后于九月致张之洞函中，所说“贸然入院，名轻学浅，果见推排，势不可已，与相搪突”，即指此事。引见《湘绮楼笺启》卷2，第845页。

^④光绪五年九月八日乡试揭榜，尊经书院取中二十多人，王闿运翌日高兴地在日记中写道：“余既喜教之可行，遂有留蜀之志。”第二天又“颇有迎春之意”。见《湘绮楼日记》，第832页。

窃念仁兄当始终其事，以副初心。魏阙虽荣，名山亦乐，何必远期尚、侍，坐度年华？且名实虽隆，真传未显，骥骥日老，逐逐仍劳。似宜暂去承明，来游石室，五年之后，声学俱成，重入修门，未为晚也。高材难得，虚誉无凭。以今日之地望，当无敢为君劝学者，非闾运不能发此言，其以为贾生耶？汲黯耶？计领嫂双飞，懿亲欢聚，生徒喜慰，自远然轸。此间岁奉三千，差厚于监钱六百。亦使闾运得藉依声价，相与切磋，是所愿也，非敢望也。委曲已略告竹笈编修，余意更令诸生面启。先此致恳，伏希深察。蜀士英妙，儆守而教之，定轶卿、云，开山之功，不减五丁。闾运实缘湘中有切己之事，未能久驻，明春水满，必戒归舟。^①

王闾运苦口婆心，想劝张之洞辞去京中闲差，回蜀重理尊经院事，既可造育蜀中英材，也能成就一己声名，“声学俱成，重人修门”。这实是一条以退为进、通过潜修而获致高位的终南捷径。当然，王闾运此处名义上是为人谋，事实上却是为己谋，急于从尊经书院脱身的心理昭然如揭。他所谓的“湘中有切己之事”，其实是想返湘出长校经书院，为本省作育人才，振兴湖湘经学。“舍己芸人”一语，既可见他浓厚的地域观念，也可见他以振兴湘学自任的古道热肠。十月七日王闾运写给湘中亲友的两封信中，即十分明白地说：

循诵复书，慨然有志于本朝经学之编，闾运旧亦闻绪论，而以为知言矣。但经书须有师承，自通志堂之集为世所訾，阮集出而变本以加厉，矫枉而过直。今欲求诸老生能发明师说之书，杳不可覩。……闾运将俟弟子有特达者，各治一经，皆以集解体为之，非十年不能办。孤身在蜀，舍己芸人，又无此心绪，田光所为发慨于销亡也。吾湘校经堂生或能及此，故欲辞归，为识途之马。……昨与丁公言：天地闭，贤人隐；圣人作，万物睹。圣则吾不能，贤则未敢自谢。当今之时，非独总督非隐，主讲亦岂可为隐？归与归与，老糠可然，不必吹藜。今年若不成行，明春定当还里。比日武闾事忙，尚未与主人相见，明年关聘已缓之矣。^②

讲席非可久居，一日不胜其劳，仅可一年，留去思而去之，上之上者也。丁公处尚未辞。昨司道来，问关书，随人云方大人携入京矣。有其主必有其仆，故是一段佳话，与岬、笛共赏之。今岁院生高第者二十六人，皆为二景所搜而去，颇有空群之叹。尚有十余人，未施檠括，奈思归甚切，又有校经之志，恐不能留。^{[2] (P840)}

王闾运一直自视为救世的贤才，他“出山入川”本意是要施展纵横才略，但人幕不成，聊充讲席，因而慨叹丁宝楨于人才“能知、能求而不能任”，只好在他面前屡作退隐谈，不愿碌碌居蜀，而急于返乡施教，振兴湘中经学^③。事实上，他从光绪五年执教尊经书院后，几乎年年“思归甚切”，屡作归计，最终在光绪十二年辞归湘中，并且痛言：“闾运赞幕无功，诲人复倦。今春归里，稚师亦殁，从此挽辂金门，买庐海畔，浮沉之计，薄弱所宜。”^{[1] (P990)}

费行简曾提出，王闾运因以奇策游说胡林翼、曾国藩而未果，“知事成之由命，毁誉之无真，乃退息无复用世之志，唯出所学以开教授。丁文诚公宝楨礼重之，聘任成都尊经书院院长”^{[3] (P21) ④}。此说广泛流传，甚至《清代学人列传》《清史稿》也加以采信。王闾运本人则在同治三年（1864）北游空劳往返后，写下传颂一时的《思归引并序》，隐归衡阳石门山中，“绝不与世事相闻”^{[1] (P815)}，一意读书、著述。因此，后人往往承袭费行简之说，以为王闾运应聘尊经书院真是专心于讲学育才。殊不知，王闾运光绪四年所定“出山人川之计”，绝非应聘尊经书院讲席，本志实在游幕，以图再展其“纵横奇士”的才略，扶助丁宝楨、刘长佑在西南一隅成就一番霸业。他在光绪七年一封书信中自陈：“自来曾、胡、左、丁、肃、潘、阎、李诸公相知者多，其或有许其经济者，从无赏其纵横。尝有自挽联云：‘《春秋表》仅传，正有佳儿学《诗》《礼》；纵横志不就，空留高咏满江山。’盖其自负别有在也。”^⑤所谓“纵横志不就”的豪情与悲苦，正是他对自己蜀游生涯的最好写照。

⁷ ①王闾运：《致张尚书》之二，《湘绮楼笈启》卷2，第845-846页。按，据此函内容，知其当作于光绪五年，又《湘绮楼日记》光绪五年九月廿一日有“致孝达书”，故可判定其写作日期。

②王闾运：《致彭亲家》，《湘绮楼笈启》卷2，第855-856页。另见《湘绮楼日记》，第839-840页。

③王闾运另在光绪六年致周寿昌函中，表达同样的心愿：“闾运今春甫还，因留度腊，明秋便当还湘。缘湘中经席殊不得人，欲还更张，不然反为俗派也。”引见《湘绮楼笈启》卷1，第836页。

[参考文献]:

[1]王闾运. 湘绮楼笺启[C]//湘绮楼诗文集. 马积高主编. 长沙: 岳麓书社, 1996.

[2]王闾运. 湘绮楼日记[M]. 吴容甫点校. 长沙: 岳麓书社, 1997.

[3]费行简. 近代名人小传[M]. 北京: 中国书店, 1988 (影印本).

④费行简: 《近代名人小传》, 第 21 页。

⑤王闾运: 《与李提督》, 《湘绮楼笺启》卷 2, 第 863 页。据自挽联上半句, 可知此信作于光绪七年秋间, 应在《春秋例表》初成、王代丰未殒之际。